



说爱

埃·弗洛姆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说 爱

——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人生视角

● 埃·弗洛姆 著

● 王建朗 胡晓春 译

林天斗 校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年10月·合肥

Erich Fromm
FOR THE LOVE OF LIFE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86

责任编辑：邱江生
封面设计：章 雯

说 爱

——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人生视角

王建朗 胡晓春 译 林天斗 校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130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212-00016-7/G-2 印数：1—100000

统一书号：6102·103 定价：1.7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世界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其生命最后十年所作的广播演讲的精选。在这本书里，他总结了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批评家、心理学家和一个最具灵感的人类心理的观察家的毕生智慧，以自己对于生活的痛苦和悲剧的深刻认识，对人类生活作了粗线条的勾勒，对进取、厌倦、梦、信仰、人的成长、变态心理及社会生活等问题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并分析了个人、家庭、社会共同体的力量以及爱情的超越力。此书为弗洛姆毕生著作的精华，它不仅向他的热心追随者，也向新一代的读者们推出了他的深具活力和创造性的哲学。

译者的话

生活没有教科书，它本身就是一部渊博无比奥妙无穷的大百科。任何制作“指南”、“手册”的企图，差不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

然而，人类总是不甘心无所作为的。人是什么？生活是什么？人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一切希望活得明白一些的人仍在不倦地思考着诸如此类的问题，抽象的与形象的，哲学的与文学的，一个又一个的答案纷呈在人们面前。有的让人摇头费解，有的让人点头称是，有的还令人捧一掬热泪。但人们似乎仍不满足，他们孜孜寻求更深层的东西。

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内在心理运动的科学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青睐。只是既称之为科学，其面孔就不免太严肃了点。读者往往为那些繁复的术语所困扰。然而，埃里希·弗洛姆，精神分析学的一代大师，却以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走向读者。他摆脱了学院式心理学的结构、方法和语言，以其明快

的思想、富有情趣的语言征服了人们。长期以来，弗洛姆的著作风行西方，历久不衰。

埃里希·弗洛姆，1900年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1922年获得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以后曾在慕尼黑和柏林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工作。希特勒登台后，弗洛姆于1934年移居美国，先后执教于美国和墨西哥的多所大学和研究所。1980年，弗洛姆去世于瑞士洛迦。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了极有价值的批判性的继承和创造，成为最有影响的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三大家之一。

弗洛姆是一位多产作家，他一生著有《心理分析及伦理学》、《现代人及其未来》、《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自为的人》、《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等二十多种著作。在我国，弗洛姆的名字也渐渐地为人们所熟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弗洛姆著作的中译本已有《逃避自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使命》、《爱的艺术》、《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等，颇受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欢迎。本书是弗洛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所作的广播演讲的精选，也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如果把弗洛姆以前的作品称为专著的话，这本集子则可称为小百科，它脱出了对单个问题的具体研究，涉及到弗洛姆有着独特见解的各个研究领域，弗洛姆以大家风范对

于人类生活作了粗线条的勾勒，以他对生活的深邃认识，对进取、厌倦、梦、信仰、人的成长、变态心理及社会生活等各类问题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讨。

与别的精神分析学者比较起来，弗洛姆的理论更具有社会哲学的色彩。他擅长于从社会的宏大切面探索社会对个人心理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他从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从社会发展的运动过程考察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在精神分析学派中独树一帜，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赢得了大批狂热的读者群。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更充分地体现了弗洛姆著作的特点与风格。

尽管弗洛姆所使用的论据都取之于西方发达社会，尽管他曾再三说明，他所指出的思想情绪主要是指那些已经吃饱喝足的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并不包括那些还在为温饱而奋斗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人，完整意义上的人，是没有国界的。在我们这个历来注重“求道”的国度里，尽管不少人还在致力于生计问题，似乎无幸染上“富足病”，但对于人为什么而活及怎样活这类人生要义，却仍有不少人在苦苦思考着。事实上，弗洛姆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极为广泛地存在着。我们曾经对此付出过我们的思考。因此，读弗洛姆的

这本书，我们绝不会产生阅读译作时所常有的“隔世之感”，相反，他会以他的观察角度的新颖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弗洛姆在这本集子中涉及了许多方面的问题，他似乎漫无边际，从人的本能到社会机制，从奇诡的梦到不景气的宗教，从心理学到历史学，他无所不谈，亦无所不精。译者无意也无力在此一一介绍。但有一个中心我们是肯定的，弗洛姆始终不脱离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他觉得在现代社会中人已经偏离了他应有的生存目标，为物质而奋斗，为成功而奋斗，人的价值被用物品或权力的占有量来衡量，而人生的本义却被忽略了，由此而产生出一系列的病态。他深沉地指出：“有许多人从来不知道幸福，但没有任何人从来没有经受痛苦”，很多人完全不知道生活是什么，他们在开始生活之前就已经死去。他认为这实在是人生的一大悲剧。他急切希望迷途的人们重新回归到人的领域，开始真正的人的生活。

在众多的心理学流派中，弗洛姆以他的清新和活力而著称。读他的著作，绝不会碰到使人望而却步的一大堆专业术语，或是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的冗长的抽象逻辑推理，一切都是那么浅显、自然。然而，它所表现的思想又是那么深刻有力，它揭示

了隐藏在我们行为背后甚至是动机背后的东西，令人久久难忘。读者会惊奇地发现弗洛姆所说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时常碰到，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问，不由自主地想：为什么我要那样做？为什么我没有这样想？这也许就是弗洛姆吸引千百万读者的独特的魔力所在。

“开卷有益”，事实上，这样的书并不多。常常有这样的事，有许多书尽管也许能给读者增加些微知识，但却并不能使人变得丰富，即使读完十本这样的书，这个人仍然与过去一样，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不是常常看到这样的人吗？他在某些方面或许颇有知识，然而他在做人（不是通常所指的人际关系）方面却让人感到可笑和可怜。但是，当你读完弗洛姆的这本书，我敢断言，你一定会发生某种变化，你看问题的方法会不自觉地发生某些改变，禁不住要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深处，投向背后，投向最隐蔽的地方。当你面对着生活的厌倦和苦恼时，面对着政治家动人的微笑时，面对着无法把握的社会崇拜或个人爱恋时，甚至是面对着某些售货员冷漠的面孔时，你想到的并准备做的可能会与从前的你大大不同。这不是说弗洛姆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先知，他我们的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答案。不，远不是这样，弗洛姆做不到这一点，任何人也做不到

这一点。弗洛姆所做的恰恰不是给予答案，而是引发我们产生一种自己去思考的欲望，一种主动的思考。

弗洛姆是站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的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密切关注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压抑，关注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问题。他认为弗洛伊德从个人方面，而马克思则是从社会方面揭示了人的病态，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医治社会病态心理以造就真正的新人的两位思想家。他力图把他所认为的马克思的精华和弗洛伊德的精华融合到一起，使其互增互补，以创造一种更为完善的学说。他自述“我力图得出一种综合物，从对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解和批判中是应当得出这种综合物的”。弗洛姆所说的这个综合物就是他以毕生之力所进行的“受辩证法和人道主义指导的心理分析”。他赞赏马克思的辩证法和社会分析的方法，把它引进了精神分析领域。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有限的，尽管他认为，与弗洛伊德相比，马克思是“一位更加渊博、更加深刻的思想家”，但他的根本立足点仍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这一点，当由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思考和批判。

作为译者也无庸讳言，无论读者持有何种观点，在弗洛姆的这本书中总是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商榷之

处。但这并不要紧，译者不是为弗洛姆招揽信徒，无论读者是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还是能够由此产生批判的欲望和能力，只要本书能够唤起读者对于生活的一些已经忘却的思考，译者之意便已足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蒙诸多师友惠助，无奈译者功力尚浅，深恐拙译未能传神达意，故不敢在这本菲薄的小册子前面一一鸣谢，以免有借其大名壮威之嫌。但马勇先生却是不能不特别提出的，没有他的帮助和督促，很难说这部译稿何时能与读者见面，在此谨向他以及一切关注本书译校的师友致以谢意。

林天斗先生承担了本书的主要校阅工作，姚诗夏先生也校阅了部分译稿。两位先生作了极为认真的校订，但由于时间仓促，书中讹误之处仍恐难免，当由译者负责。本书第五篇、第六篇由胡晓春翻译，王建朗翻译其余部分。不当之处，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1987年5月

前 言

本书记录了埃里希·弗洛姆在他生命的第八个十年亦即最后十年内的深刻思考。他的工作永无止境，他一生都在阅读、写作、计划和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是坦率的，兴致勃勃的。在这最后的十年中，凝结在他留下的十卷著作中的毕生劳作达到了高峰和终极。作为我们时代的一位敏感而中肯的评论家，他的演讲发挥了他著作的主体思想。本书收入的这些保存下来的广播讲稿，是对其著作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补充。这些材料的价值不只在于它们的新颖，更在于它们的活力，在于他的富有深刻说服力的个性表达。这些谈话大部分是在弗洛姆的公寓里录音的，其余则是在苏黎世的播音室里。在阅读这些文章时，我们如身临其境，仿佛又在参加这位伟大老人如此谦和地邀请的那些会议和谈话。

除了以古拙而富于学院气息的德语写成的一些

早期著作外，我们这儿的人所熟悉的弗洛姆的德文作品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但在这些广播演讲中，弗洛姆恢复了他的母语，而他的风格——从书面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则具有一种明显的紧迫感。马瑟思·克劳迪斯(Matthias Claudius)曾把书面语言说成是把酒渗入水中的魔幻漏斗。弗洛姆也喜欢口头语言，直接演讲。这里我们发表的就是他的口头语言。凡是曾经听过他演讲的人，在阅读这些报告时将会再次听到他的声音。

我第一次见到弗洛姆是1970年在苏黎世的斯图海恩。以后我们经常在那里会面。他在各地都有他喜爱的旅馆，很难想象他会愿意放弃主人的角色。我们谈论着一系列有关富足和厌倦的话题，第二天他就在苏黎世播音室替我们录了音。他带着他惯常的热切神情坐在我对面，全然不顾周围的忙乱与喧闹，向我概述了他那些话题的观点。当他一讲完，我想：是啊，正是这样。可是不，该轮到我了。他征询我的意见，他尤其关心他将可能对什么类型的听众演讲。他的主张和问题显示出他对德国生活是何等熟悉。他想尽可能紧密地吸引他的听众。讲他们的语言，但不只是讲他们想要听到的东西——这就是他的格言。弗洛姆的准备很充分，他带着数量惊人的笔记和手稿，当我们谈话时，他还在不断地

添加。但是第二天早晨当他出现时，他并没有携带任何东西。我问他是不是不愿带公事皮包，他逗趣似的摇摇头。我们驱车来到播音室。他顺当地坐到麦克风前面，开始即兴演讲。他讲了六个部分，每一部分准确地持续二十九分钟。弗洛姆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我必须在场。他需要一个演讲对象，不知名的听众的一个代表。聆听他这种自然而精炼的论述，是我们在收音机中很难感受到的一种快乐。

当埃里希·弗洛姆正在阐述他的论题，向我介绍关于苏格拉底的研究心得时，我开始注意到，在把我们与控制室分开的玻璃后面某种事情正在发生。尽管弗洛姆那时在欧洲尚未很有名气，但是有个值得一听的报告正在此间演讲的消息已经在苏黎世播音室传开。技术人员、秘书、工友，甚至从编辑室来的我的一些同事，都聚集到控制室，站着挤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在倾听着。我个人认为，广播与听众的“对话”潜能实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切不可对广播期望过高，或把它放在那种潜能的限度之外。我们试图找到一种适宜于广播的间接演讲的风格。然而事实证明，弗洛姆对于我的章程来说是一个例外。他对于这种商业工具表现了出人意外的毫不在乎，不为它们所吓住，径直跨过它们在他的道路上设置的所有障碍。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对话是弗洛姆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那看不见的只是作为精神鼓励者的听众并没有出现在他面前，但他的听众以及他的听众可能会回答他的话在他的思想中都真实地存在着。当他演讲时他能听得到。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出色的好听众。

引人注目的是，在弗洛姆身上作家和那个人是同一个人。这一个表达了另一个。他的声音是他的语言的体现。弗洛姆成长在一个具有很强口语能力的文化——犹太传统中。他的全部工作在一个主题上演出了许多变奏。它充满了反复，充满了在旧问题上的新探索，充满了要探索得更深刻、阐述得更精辟的新追求。很少有学者象他这样偏爱于一种美好的超越。对他来说，达不到极大的丰富就得承认是贫困。当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时，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他的思想、主张、洞察力和表达能力的丰富而震惊。这些作品向我们提供了无数的例证，在他的眼中不存在翳障。

弗洛姆喜欢讲故事，以此回答问题或作为解答学术问题的手段。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去拜访一位哈西特教派^①的长

^①Hasidim，十八世纪在波兰出现的一个教派。——译注

老，有人问他是否在研究这位长老的主张时碰到了困难，他回答说：“不，我只是想看看他是怎样系他的鞋带的。”这个小故事提醒我们：一种姿态常常能比一个演说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它还提醒我们：如果一个演说者不是那种名副其实的人，那么他那最精采的议论也毫无用处。当我去拜访埃里希·弗洛姆时，我总是想到这个故事。我总感到从他那儿离开时与我到达那儿时不是同一个人，我离开那儿时头脑更清醒，感情更活跃，更不易被那种压迫我们，使我们容易绝望的力量所威慑。

绝不仅是知识使他成为这样一个富有感染力的人物。这是理论的生活与生活的理论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结果。一个人活着，就意味着一次又一次地再生。弗洛姆写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我们开始生活之前就已经死去，这是一个悲剧。弗洛姆的系统并不是建立在这一类的领悟上。它要求我们不断地重新地观察事物，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弗洛姆不要门徒，不想建立一个学派。象他这样的精神本身总是力图避免被人占有。弗洛姆毫无快意地认为他自己的抽象思维的能力是有限的，他能够进行哲学思考的唯一方式就是作具体分析。

1974年1月5日夜晩，南德意志电台广播了弗洛姆的自传概述《以生活的名义》。在两个小时的从

容谈话中，弗洛姆谈了许多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不是这个节目，这是永远不会被录制下来的。一位正在斯图加特演出莱辛的名剧《智者纳旦》的女演员，在这个时候从剧院回到家中，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这个节目。尽管时间已经很晚，她还是立即过来叫我，以共享她的感受。她说，她已经离开了一个纳旦，却不料又在另一个纳旦面前发现了她自己。

弗洛姆既不是魔术师，也不是学究。他让心与大脑一起讲话的才能是智者的一种特质。

汉斯·朱根·舒尔茨